

回忆我的父亲陈铭枢

陈佛仔

1965年5月15日，时年七十六岁的父亲正参加民革中央座谈会，庆祝我国爆炸了第二颗核弹。他过于兴奋，发言中突感不适，于是到外间小憩，谁知就此不起，在送往医院途中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随后由我们亲属护送灵柩到八宝山。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我因要随学校去贵州实习，未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就离京了。后来家里告诉我，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非常之多，连嘉兴寺（平安里东，当时一般追悼会都在那里开）的工作人员都说，很少见到这样多群众来开追悼会。可见，尽管当时父亲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四人帮”被打倒后，党中央为父亲平反了。这些年，在各地和中央的报刊杂志上，提到父亲名字的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曾亲历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而且在一些事件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看来，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对他的生平作一回顾，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更重要的是对于弄清中国现代史上一些事件、研究中国现代史，都有着现实的意义。本此精神，我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时，撰写此文，一方面，向读者介绍父亲的生平，另一方面，希望就教于前辈和专家学者。

父亲于1889年10月15日出生在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璋嘉村。1906年，对于父亲来说是个有意义的年头，这年八月，他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从此，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父亲考入黄埔陆小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中。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对外屡战屡败，割台湾、失澎湖，赔款以数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一切都压在人民头上，老百姓非常不满。以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同盟会，在各地多次发动起义。当时各地的新军和军校的学生，都是同盟会所依靠的骨干力量，而军校中的革命力量特别强大。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受到了反清的革命思想熏陶，立下了反对清朝腐朽统治、建立共和国的志向，并且身体力行，经陈汉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黄埔陆小的监督赵声（字百先）是同盟会员，他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而父亲对他则近于崇拜。赵声的革命性很强，在陆小同盟会进行的反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得学生的爱戴。在陆小，除赵声外，与父亲关系密切的还有邓演达、蒋光鼐等人，他们后来也都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史上的名人。

父亲于黄埔陆小毕业后，1909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南京陆中，他更积极投身于革命，担任了陆中同盟会组织对外联络人。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革命党人举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前，父亲从各种迹象判断革命党人要举行起义，于是请假南下，到香港找到赵声，请求参加起义。但赵声认为应保存军校同盟会员这批力量，故不予同意，而催促父亲返校。后来，父亲在返校经上海时，得知起义已失败。此时赵声又因病逝世，父亲

对此极为悲痛。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反清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同年十月，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们兴高采烈，陆中同盟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公推父亲为代表，前往上海向同盟会总部请求拨给经费前往武昌参加起义军。于是父亲未向学校当局请假，便越墙而出，前往上海。到上海时，恰好碰见宋教仁要乘船去武昌，他与宋见面后匆匆说明来意，宋即给他五百元作为返南京的川资。父亲回到南京时，知道已被学校开除，无法进校，便邀同学出校商议，最后商定分三批去武昌。第一批由父亲率领，同行者有李章达、蒋光鼐、陈果夫等人。

父亲等人到武昌后，即向都督府要求渡江作战，获同意，并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在自来水厂附近打了第一仗。这一仗有些伤亡，有些同学感到打仗并非好玩，便要求离开队伍，最后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五十余人。在经历了几次战斗之后，正值黄兴去上海，父亲等人奉命随黄去沪。到上海时，上海已光复，他便负责黄兴的警卫任务。不久，姚雨平率北伐军到上海，父亲参加姚部，任连长，随军渡江作战，追击清军张勋部。在此期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南北和议达成，北伐军亦被遣散。当时摆在父亲面前有两条路：或出国留学，或进保定军官学校，他选择了后者，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父亲在保定军校期间，正值袁世凯例行逆施，图谋称帝。袁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第一次讨袁斗争。那时李烈钧在江西酝酿起义，保定军校同学闻讯决定南下参加。正待出发时，父亲接到邹鲁来信，要他去广东发动关仁甫起义（关是广东地方武装首领），于是他便只身南下，到广州后碰见朱执信。朱认为关靠不住，劝父亲不要急于行事，他听从朱的劝告，暂住广州。不久，遇见陈雨亭（同盟会员），两人遂密谋制造炸弹炸死袁的心腹龙济光，那知事未成而父亲在客栈被捕，后因查不出有力证据获释。出狱后转往香港，见到邹鲁等人，邹说：“我们正准备去为你收尸哩！”这次反袁斗争不久即告失败，父亲等人在国内无法容身，旋由上海逃亡日本，这是1913年底的事。

到日本后，父亲等人经过这次反袁失败，都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于是，他们便在东京郊外，成立了军事学校，以“浩然庐”作为代号，聘请日本退职军官讲课，父亲参加了学习，后来，又到政法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父亲与后来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的吕超、胡景翼等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通电国内各省发动反袁起义，全国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死。袁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而父亲亦于此时由日本回到祖国。1919年，参加广东的地方部队——肇军，任营长职务。此后数年间，他曾随部队辗转各地，直到陈炯明打败桂军为止。这一段时间，正是孙中山为打倒军阀政府而在广东筹组军政府的时期。1919年10月，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1920年返回广州组建军政府，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当时孙中山依靠的主要是粤军、滇军等几支地方武装力量，而粤军的广大官兵，自始至终是孙中山革命的主要力量。父亲正在此时加入粤军。从此，他

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而奋斗。

话再说回来，陈炯明赶走了盘踞广东的桂军陆荣廷部后，认为有必要对军队加以整编，便任邓铿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负责训练新式军队。第一师成立时只有三个团，且人员复杂，邓不甚满意，想另成立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一个团。那时父亲正率部驻于广东阳江、阳春一带，任西南标统领，手下有兵力四营，士兵多为钦（州）、廉（州）、罗（定）、阳（江）子弟，属下骨干有陈济棠、蔡廷锴等人。阳江本是富庶之地，但父亲看到粤军在邓铿的主持下面目一新，有意投奔。恰好这时邓演达在第一师任参谋，邓演达是父亲在黄埔陆小的同学，关系很好。于是由邓演达将父亲欲投奔粤军的意愿向邓铿透露，获得同意。不久，父亲所率四营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父亲任团长，戴戟任副团长，陈济棠任营长，这第四团就是以后威震中外的第十九路军的前身。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8月，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出师北伐北洋军阀政府的决议。父亲作为广东革命政府主要武装力量——粤军的军官，在北伐正式开始前（即1926年6月9日）的数年中，曾参与了许多事件，主要有：

一，1922年2月，孙中山先生组织第一次北伐。5月，北伐军出师韶关，进攻江西。父亲率第四团与北洋军阀陈光达部在江西赣州南边霸王岭激战达七昼夜，最后攻克了赣州。

二，1925年陈炯明叛变，广东政府组织了第一次讨陈的东征。在东征前，第四团于1923年扩编为第一师第一旅，父亲任旅长，下设两个团，一团团长张发奎，二团团长蒋光鼐。这次东征，第一旅在兴宁神光山击败陈炯明主力林虎部，随即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平叛后，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旅也改编为第四军第十师，任父亲为师长兼第四军参谋长。

三，1925年冬，父亲任南路总指挥，参加了打击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八属联军”（简称“八属军”，属陈炯明势力），“八属军”被消灭后，父亲又与白崇禧出使湖南，与唐生智接洽，使唐投向广东革命政府。

1926年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中，第四军由广东出发，担任攻打盘踞湖南、湖北的北洋军阀中战斗力较强的吴佩孚部。其时，父亲以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兼军参谋长职，率领第十师参加北伐，并率先攻克湖南醴陵、平江，随后直逼武汉的南大门——汀泗桥和贺胜桥。在这两个地方，第十师与叶挺独立团和张发奎部打了两个漂亮仗，歼灭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使“吴大帅”闻风丧胆，狼狈窜逃。随后，第四军兵围武昌城，收复汉口、汉阳等地。这一战役，父亲与叶挺、张发奎将军名闻遐迩，被誉为“铁军”。在郭沫若的回忆文章《北伐途次》中，把父亲喻为关云长、叶挺喻为赵云、张发奎喻为张飞。第四军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伤亡甚重。许多架梯攻城的士兵被打死在城下，尸体一时无法收殓，直至破城后才能安葬。数十年后，父亲旧地重游，回忆往事，感慨良深。武昌攻破，生俘守敌刘玉春等将领，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至此，吴佩孚主力几被全歼，一蹶不振。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第十师改编为第十一军，父亲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除原来的第十师外，又增编了第二十四、二十六两师，蒋光鼐

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任副师长，戴戟任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任第二十六师师长。第十一军成立后，继续北伐，曾与奉军张作霖部大战于河南临颖。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父亲和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第十一军，其间叶挺曾一度代理军长职，并率十一军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蔡带领一部分队伍去福建，在福州重建第十一军。这时父亲又回到军队，重任十一军军长。父亲再任军长后，便将队伍带回广东。那时，李济深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十一军又隶属李的领导。1928年冬，父亲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29年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个师。1930年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六十、六十一师被蒋调往山东前线，并在济南改编为第十九路军，此为十九路军的正式建制。

1930年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12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1931年6月，蒋介石亲赴南昌组织对江西中央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6月25日，父亲被任为“剿赤”右翼军总司令，9月30日又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

在长期的内战中，十九路军将士深感厌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曾在江西集体宣誓抗日。当时十九路军将领曾倡议组织抗日义勇军，赴东北前线抗日。正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宁粤分裂”，这对十九路军和父亲以后的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扣留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激起国民党内部尤其是广东方面的反蒋力量的一致愤慨，宁粤分裂自此开始。五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宁粤正式分裂。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揭开了全面入侵中国的序幕。在日军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被迫与广东方面谈判。此时，广东方面提出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沿线，保卫广东方面的代表进入南京。蒋被迫于9月30日任命父亲为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11月8日调十九路军进入沪宁沿线。十九路军入沪宁完成布防后，广东代表到南京，开始宁粤谈判，并达成协议，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林森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父亲任代理行政院长。12月28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父亲改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蒋介石下野后继续进行破坏新的中央领导，孙科被迫于1932年1月25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就在此时，驻沪日军于1月28日深夜，向驻守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第78师发动突然袭击，遭到十九路军将士的反击，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淞沪抗战”。事变发生前夕，种种端倪已表明日本军队将在上海挑起事端。于是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电告父亲，将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父亲接电后，即派参谋处长樊守迟代表他赴上海参加会议，并指示三点，主要内容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1月28日当夜，日军被击溃，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父亲去电报告战况，然而何却复电大加申斥，指责十九路军“违抗命令”。据十九路军总部参谋蒋达文回忆，当时三位长官接到何的电文后，气得一言不发。正在此时，他

们又接到父亲的回电，大意是把我们的十九路军将士的鲜血洒在黄埔江头，……，我即来沪与我袍泽共赴国难。

蒋介石等人对淞沪抗战十分不满，认为十九路军破坏了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故在表面上也说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但在背后则多方掣肘，在增援十九路军问题上作文章。先是说什么增援部队来不及开赴前线，后又说怕日军炮击。为此，父亲多次与他们作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就增援问题多方设法。何应钦多次对父亲说：“仗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父亲则对何的言论作针锋相对的回答：“前方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由于蒋、何不予合作，故十九路军坚持数月后被迫撤退，淞沪抗战就这样被扼杀了。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行动，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而遭其忌恨。于是，蒋便于1932年1月撤去父亲的京沪卫戍司令职，强迫出国“考察”，又于3月4日先令十九路军分散调离上海，因遭反对后改令调往福建“剿共”。此时，父亲和十九路军将士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遂下决心反蒋抗日。

宁粤分裂时，父亲曾与邓演达、蔡元培联络，计划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去广东与广东反蒋势力作战的机会，武装占领广东潮、梅一带，建立以邓演达、蔡元培和父亲为首的“第三种势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主要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后来宁粤分裂得以和平解决，十九路军也未开赴广东而驻守沪宁沿线，故此计划未能实现。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蒋介石秘密逮捕，11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邓与父亲有多年的交往，他始终以总政部主任身份随四军冲锋陷阵。邓的无辜被害，更促使父亲下定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国内抗日派别联合阵营的决心。这一决心就成为日后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蓝图。

1933年夏天，父亲从欧洲回国，抵达香港时，蔡廷锴、陈济棠派代表迎接，随后开始了紧张的反蒋抗日工作。按照父亲开始的设想，如能将陈济棠联合起来，形成福建和广东的联合，力量不仅大得多，而且互相支援，不致孤立。除了广东的陈济棠之外，父亲还与章伯钧、黄琪翔、龙云、刘湘、冯玉祥、方振武、李烈钧、韩复榘、杨虎城等人取得联系。此外，父亲还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触和会谈，取得中共的谅解和支持。九月，父亲由香港到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协商后，又派徐名鸿到苏区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在进行了以上准备工作后，便在香港李济深家里召开会议，参加者有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章伯钧、黄琪翔、徐谦、李济深和父亲。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筹备会。会上，父亲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要图中华民族的生存，就非抗日不可；要抗日就非先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不可”！会议决定，与会诸人立即赴福建，参加筹备建立革命政府工作。当时，中央红军也派叶挺将军住在蒋光鼐家中，协助筹划。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蒋介石曾于1933年11月18日打电报给父亲，声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父亲“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希望和衷共济，不要发动福建事变。翌日，父亲复电斥责蒋仍坚持“剿共”惧日政策，并于复电前拒绝杨森来闽劝阻反蒋抗日的说项。1933年11月20日，父亲和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

民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在成立大会上公布《人民权利宣言》和《人民政纲》十八条，痛斥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的罪行，号召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21日，宣告脱离国民党，与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签定抗日停战协定四条。父亲在福建人民政府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金钱收买的破坏下，为时不到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危急时刻，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坚决反击民族的敌人。在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是也应该团结起来，摒弃党派之见，为中国的统一和强大而共同奋斗吗！

福建事变失败后，父亲等人经广东逃亡香港。1935年，他与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团结各党派抗日力量，开展爱国抗日活动。同年，他又游历欧洲，在比利时参加了国际反侵略大会，并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其后，又应邀访问了苏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7年7月7日，中国守军对进攻宛平的日寇奋起反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祖国山河破碎的情况下，父亲再也不在国外游历，毅然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期望能够驰驱疆场，为国杀敌。但蒋介石对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而耿耿于怀，不予重用。父亲此时只在政治部担任一个挂名的指导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一直不能上前线，带兵杀敌。1938年底，武汉失守，他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赋闲，直到抗战胜利。这一期间，尤其在抗战后期，父亲所作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国民党内进步力量，进行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并在1943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个组织。

1940年以后，蒋介石对以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主力量大肆迫害，继“皖南事变”之后，又发生了封闭“生活书店”逮捕马寅初等民主人士，迫害民主力量的事件，专制独裁的气氛越来越浓。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走上联合起来的道路。1943年，父亲与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等人正式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进行反蒋斗争。

抗战胜利后，父亲迁回南京，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在短短数年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几大战役中，歼灭了蒋军数百万之众，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军事基础，父亲此时则在敌后从事瓦解敌军、策反敌军高级将领的工作，从一个侧面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当时，他亲自参与的策反工作主要有以下几起：策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起义，惜事未成而陈仪被捕受害；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与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接触，促赵保护上海移交人民解放军。此时，父亲的处境十分危险，国民党曾派特务住在我家，曾发生在深更半夜被军警搜查事件。临近解放时，父亲被蒋帮列入“黑名单”，有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为了我们兄妹的安全，他只好将母亲和我们兄妹从南京送回江苏常州母亲老

家躲避，他则剃光头化装潜入地下，直到迎来解放。当1949年他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时，剃过的头发还很短呢！

1947年12月，国民党内的几个民主派别——“民联”、“民盟”等的主要领导人齐集香港。在这里，他们实现了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父亲以“民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推举李济深为主席，父亲也被选为重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春，上海解放，他从上海北上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一起，筹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了，父亲也和国家一样，在他的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过去几十年，他一直戎马倥偬，打来打去，国家始终是疮痍满目。现在，国家统一了，战争过去了，全国人民在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中建设国家。父亲虽然六十开外，但他还与周围的党内、党外干部一起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1949年10月9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父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副主席。他在任中南区农林部长那几年，天天和年轻的同志一样按时到部上班。那时小车司机和我们不住在一起，父亲有时等不及司机，就带上警卫员徒步上班，还经常到农村和水利工地视察。例如湖北省的荆江分洪工地，就留下了他的足迹。1954年，他被调回北京工作，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工作期间，他多次到外地视察，针对视察发现的问题，在人大会议上多次发言，提出建议。那时他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建设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记得他在陕西视察时，曾发现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并交有关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外，更多的时间是找各阶层的知识分子谈话，了解情况，即使休假时也不例外。1956年夏，我随父亲到青岛休假。在青岛，他就数次找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话。通过调查，他发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滋长了一些官僚主义习气，他们不尊重知识分子，独断专行、瞎指挥。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一些意见，有些意见也许有过激之处，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但并没有坏意，用心良苦，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问题，使党的工作做得更好。

父亲生性耿直，疾恶如仇，对于腐败现象极为痛恨，这与他后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不无关系。例如最近揭示于报刊杂志上父亲对有关梁漱溟被批判乃至受谩骂一事的态度，是最能说明他的性格了。当梁被批判、谩骂时，绝大多数人都缄口不语，而父亲与何香凝等人她敢于当场以“梁漱溟究竟是敌对分子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委婉方式向批评者“请教”。

“反右”以后，父亲被免去人大常委等职务，并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在接受批判中，最使他忍受不了的，是说他“出卖”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但他毕竟是一位坚强的老人，如同过去的政治生涯中遭受挫折一样，很快就把苦恼抛到脑后，为国家的建设和祖国统一，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他那时的“工作”只限于每月到政协学习几次，还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和冷眼，而他总是默默地做他应做的事。

晚年，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民国、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有的直接参与筹划，自有许多鲜为人

知的第一手资料，在有生之年写出来，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是有裨益的素材。到1965年他去世前，已写了《宁粤合作亲历记》、《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等。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例如“福建人民政府”已在起草阶段，可惜天不假年，他的突然去世，使这一段重要历史事件至今仍无一个全面而较权威的回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小小遗憾。

1962年，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但仍被“闲置”，他毫不计较，而是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以“小我”比作个人，“大我”比作国家。他常对我们子女说：“小我要服从大我，要融化到大我之中去”。除了写回忆文章之外，这几年可说是他一生中较为“闲静”的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他喜好的事，例如写诗和写字。父亲爱好文学，但以前忙，很少有时间看书。这些年，他补看了一些小说，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并写了一些诗作。可惜，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多数都散失了。父亲写字，刚劲有力，神采飞扬。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集》，里面有一幅父亲写的中堂，是集《天发神讫碑》所写，气势雄伟，结构严整。那几年，他每日必写数篇大字，其中很多是用旧板纸写的，这些自然不复存在，而留给我们子女或亲友的也不多。父亲晚年才开始学画，所画只有一种，就是“兰”。虽是学笔，倒也不失法度。他常说：“书、画是相通的自有联系存在焉”。他把他画的兰称作“贞兰”，这其中当然包涵了他的思想和情操。再有闲暇，他就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园游玩，谈话。他去世前的两三天，还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到香山游了一天。

1964年以后，我国经济从三年困境中走了出来，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秩序良好，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父亲目睹这一切，深为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高兴。他常对我们赞颂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而对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这绝不是做作，他确实忘却了“小我”，把自己融汇于我们祖国这个“大我”中去了。1950年，父亲写过一首题为《历史》的诗：“历史最公道，亦复无情留。”……莫从小己想，大海汇千流。”

父亲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众多的事件，他的一生，正是中国人民为了独立、富强，为了在当今世界上能与先进国家并立而奋斗、而反抗、而流血牺牲的数十年。父亲的一生，正由于他参加到中国人民上述斗争之中而显得有意义。自然，这中间不无曲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曲折或许是难免的，但历史是公道的，父亲的一生，现在已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将给以应有的评价，这也是历史的“最公道”处。

(作者现任唐山钢铁公司工程师)